

回憶先師余英時教授

Remembering Prof. Yü Ying-shih

賴大衛 (David Curtis Wright) 著，王千瑀 (Wang Chien-yu) 譯*

余英時教授並非我在普林斯頓大學當研究生時的導師，杜希德 (Denis Twitchett) 教授才是，但我修了很多、也旁聽了很多余教授的課，當時我盡其所能地修習或旁聽余教授的每一門課，無論是大學部或研究所。我最初和余教授見面是在 1987 年 9 月，剛剛抵達普林斯頓時，我覺得自己就像一個來自遙遠的猶他州的鄉巴佬，有點害怕和擔憂。他是我在普林斯頓第一位遇到並交談的教授，如同我第一位交流的博士班同學王汎森一樣，他們倆都改變了我的一生。

當我初見余教授時，我和他談到我對臺灣史的熱衷。在我還是個大學生時，寫過關於 18 世紀後期臺灣林爽文之亂的論文，我的史料來自叛亂中被牽連者的審訊（可能是在酷刑之下）書面記錄（這些資料當時被保存在土林的故宮博物院）。在 1984 到 1985 的那學年，我在臺北的校際中文學習計畫（美國各大學中國語文聯合研習所，通稱「史丹福中心」）讀了這些手稿和其他清代史料，在那兒獲得解讀這些史料的能力可能有助於我進入普林斯頓。

我告訴余教授，我在研究生的階段想繼續研究臺灣史。令人訝異的是，他馬上告誡我不要這麼做。他說：「這樣很危險」，並解釋說我不應該在博士班初期就鎖定如此精確而狹隘的目標，他建議我「在不熟悉的水域裡游泳」一段時間再選擇其他題目。我接受他的忠告並

回到我次要感興趣的主題：前近代中國的外交關係，尤其是與中國北方游牧民族的關係，我先前還是大學生時當札奇斯欽的研究助理就對這個主題產生興趣。

余教授的建議並沒有錯，如此一來擴展了我的領域和興趣，我認為這有助於找到我的第一份學術工作。（我懷疑如果我只專注在臺灣研究，那些尋找受過廣泛訓練的亞洲學者的大學便不會雇用我。）無論如何，我現在已經能在自己職業生涯的後期回歸臺灣史研究。

我曾經在余教授的研究生課堂上做過一次有關林爽文的報告，而他似乎並不介意。當我開始講述林爽文之亂過程中的細節時，他對叛亂了解之深令我感到驚訝（甚至是嚇到）！當我解釋到乾隆皇帝如何因為當地居民勇敢而堅決地抵抗林爽文軍隊之進攻，而將諸羅縣改為嘉義縣（「嘉其忠義」，這個地名沿用至今）時，余教授說他早就知道了，因為他之前已經在清朝地方志中讀過！這是我第一次直接感受到他廣博的知識以及驚人的記憶力。

我自己不是個抽煙斗的人，但我發現余教授抽煙斗的儀式很吸引人，甚至令人著迷。他的煙斗裝備包含一個摺疊式壓棒、一個煙草袋和火柴（我不記得他常使用打火機）。他在上課剛開始時會小心地裝填好煙斗，接著他會點燃五六次，但每次都會在途中停下來，因為他想評論講者提出的某個特定觀點。然後他會點燃另一根

* 作者現為加拿大 Calgary 大學歷史系副教授。譯者現為臺北市立大學特殊教育學系碩士班語言治療組碩士生。

火柴，用它靠近煙袋，在說另一件有趣的事情時讓火柴燃燒殆盡。在真正點燃煙斗之前他有時會這麼做好幾次，之後他就會讓火柴保持在燃燒狀態，通常是如此。但如果他不得不走到黑板或他的書架之前，他會將煙斗留在座位上。等到他回到座位時，又要再次重複以上的冗長過程，徒留同樣一堆白費的火柴。

史坦貝克（John Steinbeck）曾經寫道，氣味的記憶力道很強。他是對的。每當我來到學校，打開通向 Palmer Hall 和 Jones Hall 之間走廊大門時，我總是能馬上知道余英時教授或宋史學家劉子健先生是否在他們的研究室裡，因為他們煙斗掩蓋不了的氣味往往在空氣中瀰漫著。我很確定如今的普林斯頓大學不再允許人們在室內抽煙斗，但我會永遠懷念煙斗和煙草的味道。直到今日，我仍然將此氣味與學習聯繫在一起。

余教授兩次在我的口試中替補杜希德教授：一次是在 1990 年的資格考試，另一次是 1993 年的博士論文答辯（杜希德教授當時在處理他的妻子即將離世的不幸之事，她在之後的那個夏天去世），余教授當時相當了解我的論文內容，是一位稱職且熱心的委員會成員。



1993 年 6 月筆者普林斯頓博士論文答辯成功後在余英時教授的辦公室合影。（筆者特別請余教授拿著他的煙斗，希望會永遠記住這一幕）。從左到右：Elizabeth Endicott-West 教授、筆者、余英時教授和裴德生（Willard Peterson）教授。

在 1993 年 6 月的一個悶熱的日子，我的博士論文是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系最後三篇進行答辯的博士論文其中之一（另外兩位是 Tom Nimick 和已故的 Marcus Keller）。當我的答辯結束時，裴德生（Willard Peterson）看著其他兩位委員余英時和 Elizabeth Endicott-West 有些疲倦地說：「我們就告訴他通過了，不需要離開房間隔離審議了，好嗎？」余教授熱情地點頭表示同意（我想他當時和其他人一樣累）。如此一來，我就免於那痛苦等待命運宣判的儀式性三十分鐘。我將永遠滿懷感激地銘記裴德生教授的動議和余教授之附議，那天我是唯一一個這樣離開的人。

余教授勇於說出他的想法並承擔其後果。在 1970 年代，當他敢於將毛澤東與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一個隨著年紀漸長變得越來越偏執與不穩定的人）做出適當且準確的比較發表之後，他在中國官方媒體上遭受到三個星期的猛烈攻擊（就如同最猛烈的打擊會引發最響亮的叫聲一樣）。在 1990 年代，他對擔任毛澤東私人醫生的李志綏所寫回憶錄¹發表一篇諷刺性而具鑑賞力的評論，題目為〈在榻上亂天下的毛澤東〉，這再次為他招致了美名與罵名。但他也是個富有同情心、感受力與高情商的人，有時候讀到關於自己國家人民所受苦難的故事，也會被深深地打動。有一次，他讀了一組有關南京大屠殺的資料，之後整整一個月無法入睡。

余教授除了為人和藹可親、學識一流之外，還具有極佳的幽默感。在一堂關於滿清征服中國的課程中，我們討論到這一事件流行的羅曼史，我因而提到了陳圓圓的故事及其如何引發這場戰爭的假想角色（我會知道陳圓圓是因為一位喜歡閱讀歷史言情小說的臺灣朋友告訴我的）。當我談到我的中國友人有時會驚訝地睜大眼睛說：「什麼？你研究清史居然不知道陳圓圓？」時，他笑得很開心。出於某種原因，這真的戳中了他的笑點。他的幽默有時是為了自謙，他很擅於自嘲。有一次他向我們承認，連他自己都對三國歷史以及哪些是基於《三國志》、哪些是來自《三國演義》而感到困惑。還有一次，他在黑板上寫下了「凳」這個字，然後把頭轉到一

1 Li Zhisui, *The Private Life of Chairman Mao: The Memoirs of Mao's Personal Physician*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4).

邊，盯著看了一會兒，笑著用中文說：「等一下，這不是『橙』嗎？」

余教授的第一本英文書是關於漢代對外關係，此書引起了研究同一主題的西方史學家一些懷疑與批評。簡而言之，他們某些人表示懷疑，認為余教授在有意無意之間認可傲慢的漢族中心主義（以中國為中心），即中國處於世界中心的概念和觀點，四周被較為弱小而野蠻的人群圍繞。余教授很快地抓住了問題的核心，在一次課堂上對我們說：「這些批評的問題在於我是中國人。如果我不是中國人的話，他們就不會有這些懷疑。」在這件事情上，他是絕對正確的。毫無疑問這樣的漢族中心主義在漢代的確存在，但將其扣帽子到 20 世紀中一位知識淵博且負有盛名的紳士上，就太過離譜了。這或許並不同於全然直接的種族主義，但至少是基於種族對他的懷疑，這在學術脈絡與學術社群中無論在當時或現在都是不得體而愚蠢的，在今日任何文明的機構或學術單位等等更是如此。基於種族的歸類和推斷就是一種糟糕的形式。

2014 年春天，我在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做研究，當時我正在寫一本關於臺灣白色恐怖的書。在那裡，我目睹了太陽花學運從第一晚的爆發到接下來的發展。連續兩個星期我每天晚上都去立法院四處走走，並

和人們交談，拍下數百張照片和影片。我被整個運動吸引住了，以至於我後來寫了一篇長篇個人經歷的記錄。²

結果余教授對此有著敏銳的洞察，看到臺灣太陽花學運的真實面貌——公眾情緒和焦慮的自發性發洩，而非只是由一小群外部煽動者唆使和安排的一場動亂。在他發表這番言論後不久，他的書在中國就被禁了，當我告訴王汎森這件事時，他說：「太好了！現在他的書會更好賣了！」臺灣的深藍人士也對余教授非常不滿，但這並沒有嚇到他。畢竟他是一棵經常遭遇大風的大樹，而他對此早已習以為常了。

余教授學問的廣度和深度可由以下事項加以證明：他在 1967 年出版關於漢代中國對外關係的優秀專著，³因而在匈奴研究圈裡享有盛譽。與此同時，他在思想史學界也因為對於中國題材的廣泛研究而聞名。但他在這兩個圈子並沒有同步廣為人知！也就是說，思想史家有時得知他早期的漢人與匈奴研究會感到驚訝，而匈奴研究學者則會特別驚訝於他在中國思想史領域裡做了那麼多的研究，由此可見余教授有著多元的心靈和興趣。如果有什麼方法可以暫時改變天命，讓像余教授這樣真正優秀的人得到殊遇，創造出兩種版本的他將會同時在匈奴和中國思想史研究中產出大量的重要作品，且兩者都具有同樣的里程碑意義。

2 David Curtis Wright, "Chasing Sunflowers: Personal Firsthand Observations of the Student Occupation of the Legislative Yuan and Popular Protests in Taiwan, 18 March - 10 April 2014," *Journal of Military and Strategic Studies* 15.4 (2014): 134-200. <https://jmss.org/article/view/58140/43749> (Accessed 3 October 2021.)

3 Ying-shih Yu, *Trade and Expansion in Han China: A Study in the Structure of Sino-Barbarian Economic Relation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7)。當我在普林斯頓大學讀書時，余教授很慷慨地贈送我一本，並為我簽名。我至今仍加以珍藏。